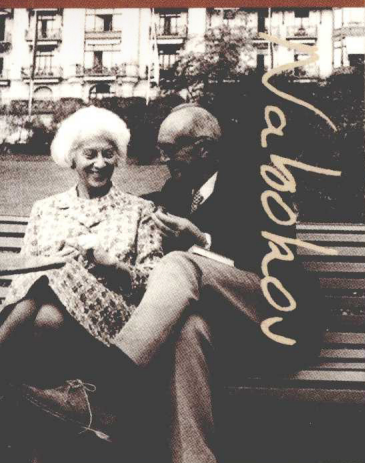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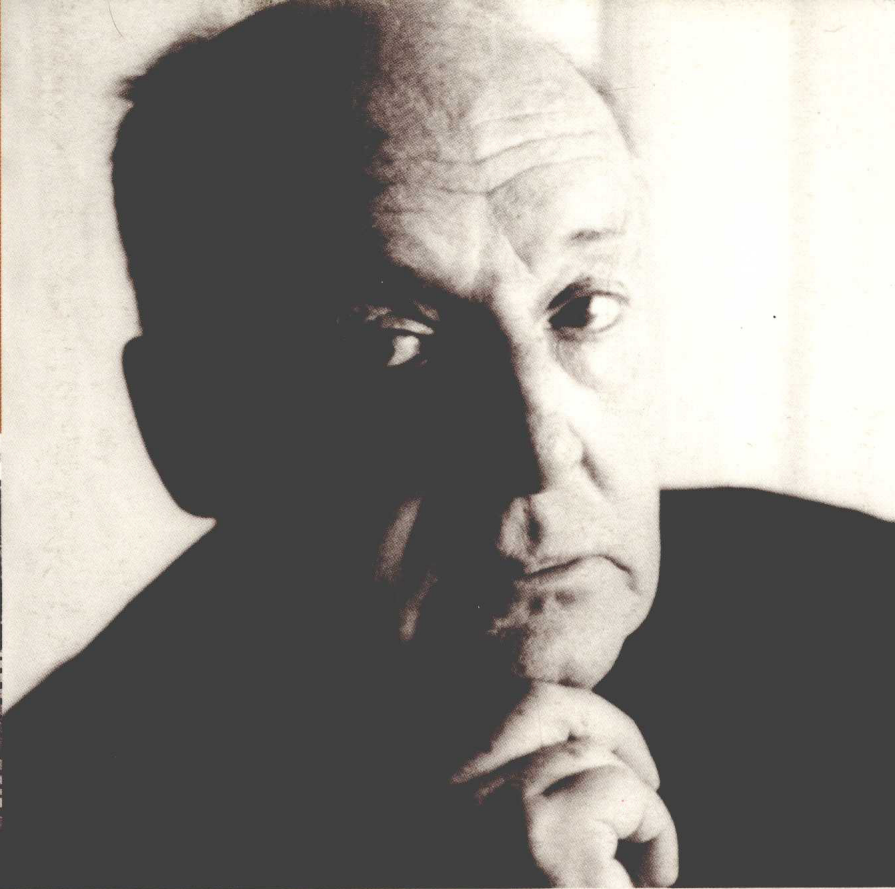


*Vladimir*



*Sabohov*



# 纳博科夫传

美国时期（下）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部真正的不朽之作……纳博科夫终于找到了一个配得上他的传记家。

—— 沃尔特·肯德里克，《纽约时报书评》

【博伊德是】一个受神灵启示的阐释者……在《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中，【纳博科夫的】生平与艺术相互交织，相反相成，这就需要博伊德这样技法高超的传记家，去追踪每一个迷人的峰回路转。

—— 安妮·泰勒，《大西洋月刊》

一部细节丰赡的传记……【博伊德】令纳博科夫的所有读者都心存感激。

—— 戴维·洛奇，《洛杉矶时代书评》

近年来最美轮美奂的文学传记之一，纳博科夫作品所能有的最优秀的导读……这部惊世骇俗的传记既是一丝不苟的学术研究的范例，也是想象力丰富的文学批评的典型。

—— 迈克尔·德达，《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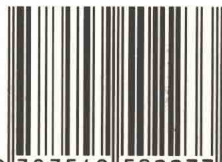
在这部传记中，博伊德先生终于给了我们一个可靠的生平和众多值得信赖的作品——他描绘了一个英勇的艺术家，描绘了这个艺术家可爱的家庭，他对伟大的活力与斑斓的色彩做了审慎的历史叙述，他热情洋溢地对大师的文学作品加以阐释。一部非凡的读者指南。

—— 理查德·洛克，《华尔街日报》

  
双鹿文化  
www.shbbt.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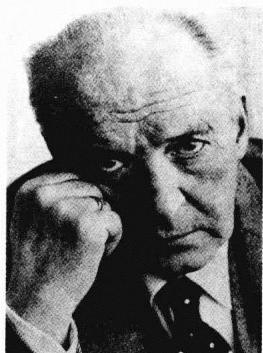
推荐上架类别：人物传记

ISBN 978-7-5495-0223-3



9 787549 502233 >

定价：80.00元（上、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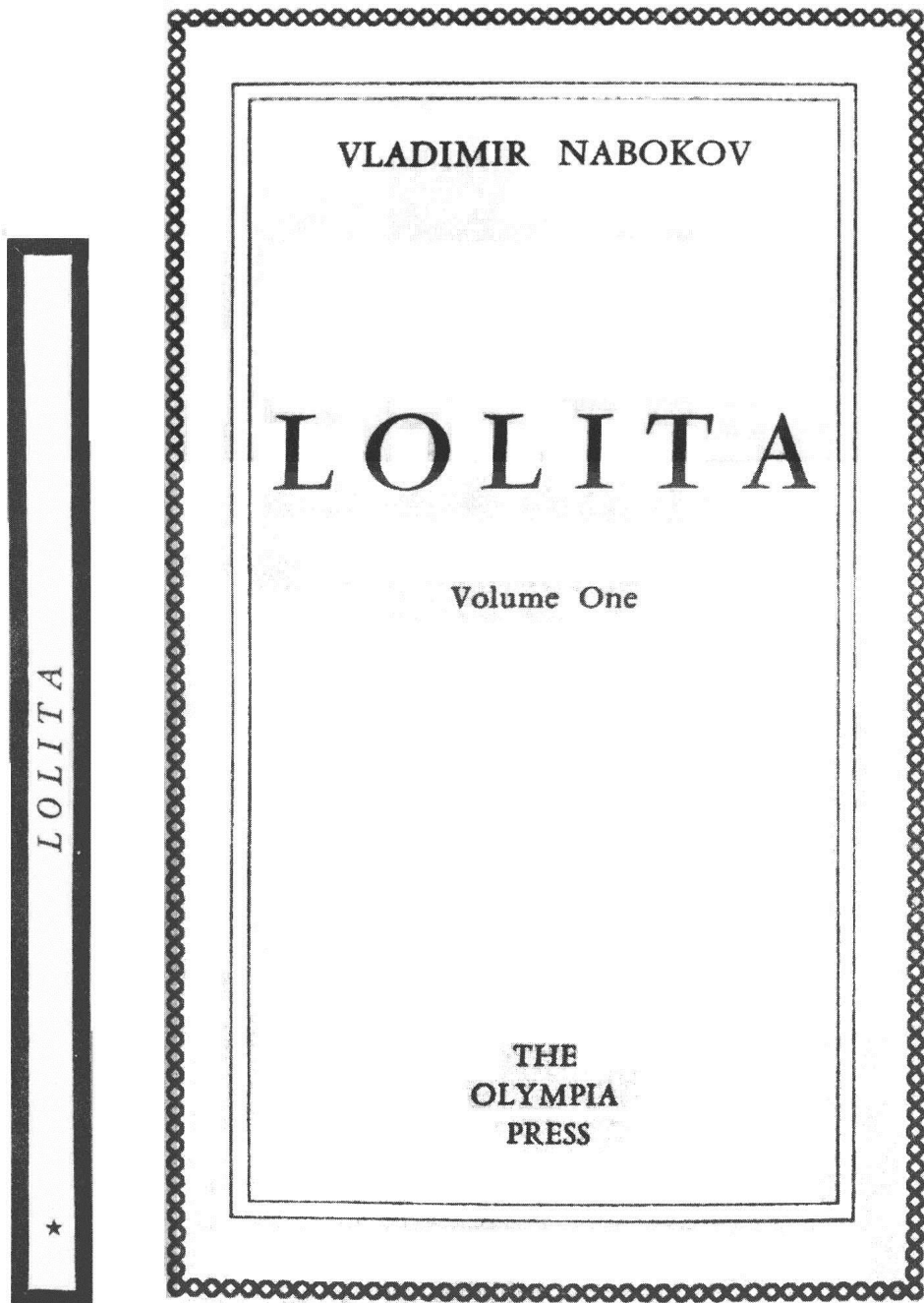


# 纳博科夫传

美国时期（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洛丽塔》第一版封面及书脊，巴黎，1955年。

第二部分  
欧洲  
·  
V  
N  
·

我的生活迄今已经远远超过青少年时期的向往……15  
岁时,我想象自己70岁时成为世界著名的作家,一头波浪式  
的白发。如今我的头差不多都秃了。

——《坚决的意见》

## 第十七章 为名所逐（欧洲，美国，欧洲，1959—1961）

### 一

“自由女神像竖起拇指，要求免费搭乘去欧洲。”1959年9月29日，纳博科夫乘坐的船只驶出纽约港的当天，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从欧洲来美国时，他还是个无名之辈，差不多二十年后的今天，他要返回的却是一个急着向他欢呼的欧洲，所乘轮船的图书室里也为了致敬而煞费苦心地摆上了他的几本著作，《洛丽塔》、《普宁》、刚出版的《斩首之邀》和《诗集》。他仍在敏锐地捕捉未来《阿达》的印象，仍陶醉在想入非非的名声中。几年后，当他为卢塞特在大西洋上的自杀设置场景时，会回忆起“自由号”：她所乘游轮的陈列橱窗里有“六本封面精美的《萨尔茨曼》……堆在一张英俊、沉思、如今全然遗忘的作家的照片和一只装有不凋花的明戈宾戈花瓶中间，让人印象深刻”。<sup>[1]</sup>

鸡尾酒会上，轮船船长——薇拉想，他懂弗洛伊德，却不懂《洛丽塔》——不断追问，她丈夫为什么挑这样的题材来写。博比斯—梅里尔曾出版纳博科夫在美国的第一部小说《黑暗中的笑声》，该社老总试图劝纳博科夫不跟普特南合作。薇拉写道，整个船上都是他的读者和崇拜者，尤其是异性一类。<sup>[2]</sup>

愉快的横渡——纳博科夫始终觉得，越洋客轮既悠闲自在又宽敞舒适，远比他想象的航空飞行要令人欣慰——之后，“自由号”于10月5日靠上了勒阿弗尔的码头。纳博科夫夫妇乘火车去巴黎。1940年5月他们离开时，德军的坦克即将占领这座城市。如今，美国人和汽车上演了第二次的占领。来汽车展览会的观众无法找到空余的旅馆床位，无处投宿的美国游客站在街头讨论着他们的困境。<sup>[3]</sup>纳博科夫夫妇不知道，汽车和游客已经改变了记忆中的欧洲，于是他

们放弃巴黎，直奔日内瓦。

394 他们在那里的美丽海岸宾馆住了十天，看到至少三种语言的《洛丽塔》从每家书店的橱窗里望着他们。纳博科夫的妹妹叶莉娜如今是日内瓦的一个图书管理员，弟弟基里尔是布鲁塞尔的旅行代理，纳博科夫比妹妹大7岁，比弟弟大12岁，关于他过去在俄国的生活，他与他们的共同语言很少，而关于他的流亡生活，就更没有什么话题了，因为从30年代起他差不多就没有见过他们。叶莉娜仍旧比符拉基米尔多愁善感，基里尔则更爱搞恶作剧，可如今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比过去更重要了，他们在欧洲的团聚温馨又从容。符拉基米尔、叶莉娜和基里尔漫步在湖边、海岸，躺在草地上，聚在宾馆的房间里，他们一点一滴地回忆着过去的家庭，弟妹俩不时要哥哥就自传做解释，对一些小的细节加以质疑，认为这事、那事不过是家里的传说或谣言，或者时间颠倒了。他们的议论有助于他对再版自传进行微调，他最近的声名不久就要求他再次印行。<sup>[4]</sup>

## 二

这时的纳博科夫夫妇希望在欧洲待上八九个月，冬天住在温暖的意大利南部或西西里岛，春天搬到北面的里维埃拉或意大利北部，夏天则到瑞士去。<sup>[5]</sup>但他们首先必须面对闪光灯和麦克风的夹攻。

路过巴黎两个星期后，他们又回来了，这次事先在大陆旅馆预订了一个房间。由于政府查禁过《洛丽塔》，所以三年来它一直是法国报纸热议的作品，4月出版后卖得很火。巴黎媒体没有让纳博科夫休息。<sup>[6]</sup>

法国出版商在精神上也休息不下来——尽管伽利玛出版社10月23日在其高贵的沙龙为纳博科夫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但它并不知道，几年甚至几十年后，这次聚会在图书界仍余波难平。两千人参加了招待会：来自法兰克福书展的图书界人士，来自各国媒体的记者，来自巴黎文学界的评论家、作家。纳博科夫的堂弟尼古拉之子、出版商伊万·纳博科夫记得，这位贵宾面对喧闹和拥挤的场面非常无助，他求伊万“请跟我待在一起”。<sup>[7]</sup>这个晚会的许多怪事也许都可以从纳博科夫的晕头转向得到解释。

伽利玛没有邀请吉罗迪亚斯出席，但负责邀请的人觉得，如果给吉罗迪亚斯寄封请柬，也许会非常有趣。吉罗迪亚斯答应了，他想假如他和纳博科夫之



间发生某种丑闻,会让小说再卖五万册。照吉罗迪亚斯的说法,当杜西娅·埃尔加兹将他介绍给纳博科夫时,镁光灯确实闪过了,但在交谈了几句(吉罗迪亚斯的说法)或只是对某个并不知道是吉罗迪亚斯的人礼貌地咧了咧嘴(纳博科夫等人的印象)之后,纳博科夫就转身去了薇拉那里。他们曾展开过激烈的越洋交锋,结果却如此虎头蛇尾,吉罗迪亚斯不知如何是好。<sup>[8]\*</sup>

这次接触比吉罗迪亚斯所想的要淡漠得多。那天晚上,他们开车离开晚会时,埃尔加兹问纳博科夫,吉罗迪亚斯怎么样。他带着惊讶的神情答道,他没有见到那个人,埃尔加兹认为,他说的绝对是实情。埃尔加兹懂了,在喧嚣嘈杂之中,在渴望见到纳博科夫的杂沓人群之中,他把吉罗迪亚斯当作某个不相关的人了。埃尔加兹将纳博科夫的反应告诉了吉罗迪亚斯。两年后,吉罗迪亚斯在《花花公子》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对他们的见面以及纳博科夫的矢口否认做了添油加醋而又老套的描述;纳博科夫则写文章回应,对埃尔加兹将一个人带到他目前、而他确实不知道那就是吉罗迪亚斯的情形做了解释。此外,纳博科夫夫妇对埃尔加兹问题的回答可谓不谋而合,两人都才知道他就是吉罗迪亚斯,他们“一点都不喜欢他”。整件事似乎是纳博科夫和吉罗迪亚斯之间长期纠缠关系的症候:他们没有认真见面,他们对彼此没有见面的缘由看法不一,他们对彼此除握手外什么也没有做进行公开争论。<sup>[9]</sup>

### 三

伽利玛晚会上的另一次握手引起的书面反应在时间上更靠后。日娜伊达·莎霍夫斯卡娅是娜塔莉·纳博科夫的妹妹,后者是堂弟尼古拉的前妻。30年代初,日娜伊达曾在布鲁塞尔帮助纳博科夫安排过公开朗诵会,整个30年代都是好朋友。她如今住在巴黎,那天晚上她走到纳博科夫跟前,准备拥抱他。“你好,太太。”他冷漠地说,仿佛面对一个陌生人。

这次至少三个目击者——薇拉·纳博科夫、艾莉娜·科马洛夫以及日娜伊 396

---

\* 关于这一幕,薇拉·纳博科夫自己记得很清楚:“有人领着吉罗迪亚斯和他弟弟[将《洛丽塔》译为法文的埃里克·]卡亨,将他们介绍给我。纳博科夫要么不在附近,要么在他们过来时走开了。我跟卡亨(而非吉罗迪亚斯)交谈了几句,就离开了他们。吉罗迪亚斯没有被介绍给纳博科夫。”

达·莎霍夫斯卡娅本人——都认为，纳博科夫是故意冷漠，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一段时间，娜塔莉·纳博科夫来问，她妹妹为何受到冷遇。薇拉解释说，她不知情，也觉得惊讶。事实上，1939年薇拉曾因反犹问题责备过日娜伊达，后者一直耿耿于怀。最近在给纳博科夫的一封信中，日娜伊达没有向薇拉问候，甚至只字不提，仿佛她不存在似的。纳博科夫始终小心翼翼地护着妻子，他——而不是薇拉——对此大为恼火。薇拉才提到这最后一点，就被娜塔莉打断了，尽管她本来还想说，她丈夫的冷漠可能主要还在于，日娜伊达曾就他的作品写过一篇语气傲慢的文章。<sup>[10]</sup>

纳博科夫当然觉得那篇文章很讨厌，他有充分的理由。莎霍夫斯卡娅用的是笔名雅克·克鲁瓦塞，她说，纳博科夫在欧陆流亡的岁月完全处于感情的沙漠之中，他在回忆录中“连最阴暗时期的朋友都忘掉了”。莎霍夫斯卡娅似乎对《最后的证据》没有提到她的名字愤愤不平，虽然纳博科夫回忆录有关流亡生活的描写是刻意回避个人的私生活，只是对那些为俄国侨民文学做出贡献的人做了一些评论，口气远非冷淡（丰达明斯基，“一个圣洁的英雄，他对俄国流亡文学的贡献超过了任何人”；霍达谢维奇，“由冷嘲热讽和金属般的天才铸就，他的诗歌像丘特切夫或勃洛克的诗歌一样，是复杂的奇迹”；“机智、整洁、迷人的阿尔达诺夫”）。<sup>[11]</sup>

莎霍夫斯卡娅援引了《绝望》中赫尔曼的观点，仿佛是纳博科夫本人的看法，而不是他所鄙视的一个疯子、杀人犯的看法。她说，在纳博科夫的世界里，“善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噩梦和欺骗。那些寻求智慧安慰的人与其去阅读纳博科夫不如去服毒”。而纳博科夫曾以自己的口吻说，他相信“人类的善”是“坚实、光辉的真理……是个人世界可以触摸的核心部分”。莎霍夫斯卡娅认为，纳博科夫“黑色写作”中的欺骗给他带来了快感，亦如他那个最残忍的反面角色霍恩（阿克谢·雷克斯）从看着一个盲人坐到刚漆过的凳子上获得的快感。莎霍夫斯卡娅不知道，对纳博科夫来说，温柔与善良是艺术的本质，他是带着愤怒展示霍恩这样的形象的，他们歪曲了他最珍贵的价值。为了最终证明她的聪颖，莎霍夫斯卡娅说《洛丽塔》是“对美国生活尖锐而残忍的讽刺”。亨伯特伤心地说，他和洛丽塔的穿越，他们的“长途旅行只是用一条蜿蜒曲折的黏土小路玷污了这片充满信任、梦幻一般的迷人的辽阔的国土”；纳博科夫在后记中喊道，指责《洛丽塔》反美“比起愚蠢地说淫秽不道德来使我痛苦多了”，莎霍夫斯卡娅对这些都置若罔闻。<sup>[12]</sup>

娜塔莉·纳博科夫只听到薇拉有关伽利玛招待会之冷漠的前半段解释,于是转告给了莎霍夫斯卡娅,后者随即数落起薇拉来。1973年,她发表了一篇描写一个作家的小说,该作家的生活环境显然与纳博科夫相同,他在妻子去世后将她的照片收起来,顿时感到一阵轻松自由。纳博科夫去世十年后,莎霍夫斯卡娅出版了《寻找纳博科夫》,一部回忆兼批评的著作,其主题不遮不掩,就是纳博科夫作为一个作家其才能是如何在外人(犹太人)影响下枯萎的——莎霍夫斯卡娅本人是俄国东正教徒,她的哥哥是东正教的大主教——最终失去俄罗斯文化的全部利益和东正教信仰的精神价值,成为一个无根、异己、没精打采的颓废派。莎霍夫斯卡娅告诉我:“我写那本书就是针对薇拉的。但如果你这样说,我就会否认。”<sup>[13]</sup>

莎霍夫斯卡娅书中的一个指责是,自1940年离开欧洲后,纳博科夫就开始对俄国不感兴趣并疏远俄国朋友。事实上,他多年的心血都花在让英语世界的读者能够接触到普希金、果戈理和《伊戈尔远征记》,他的自传、《微暗的火》和《阿达》饱含着对俄罗斯的思乡之情,他和许多的俄国亲戚及新老朋友保持着紧密联系。莎霍夫斯卡娅认为,纳博科夫回到欧洲后忘记了昔日的俄国朋友,这也是错的。纳博科夫冷冰冰地跟她说了一声“你好”后,莎霍夫斯卡娅勉强说了句:“我希望您还记得艾莉娜。”纳博科夫说了声“当然”,就向艾莉娜·科马洛夫转过身去,后者是他朋友萨穆伊尔·基扬准采夫的妹妹,30年代末基扬准采夫对他经济上的帮助很大。他记下了她的电话号码,几天后请她吃过饭。他们整个晚上都沉浸在温馨的回忆中,他问是否可以归还萨穆伊尔在他巴黎最艰难时候借给他的钱。他还拜访了赖萨·塔塔里诺夫(如今是塔尔),二三十年代曾组织过一个文学团体;他的堂弟尼古拉;叶夫格尼娅·康纳克,20年代塔塔里诺夫社团的成员,60年代将纳博科夫的一部俄文小说译成法文。<sup>[14]</sup>

他参观了法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他见到英国出版商乔治·威登菲尔德,他与克洛德·伽利玛初次见面,他见到了德国出版商海因里希·玛丽亚·莱奇-罗沃特——后来成为他欧洲最亲密的新朋友。最重要的,他在巴黎的那一周里与众多媒体见面:《法国之光》、《新文学》、《法国晚报》、《快报》、《法国观察家》、《新文人》,还有加拿大广播公司。<sup>[15]</sup>

法国文学周刊《艺术》问纳博科夫,法国作家中他最想见谁。也许是弗朗索瓦兹·萨冈?不,纳博科夫答道,他只对雷蒙·凯诺和阿尔·罗伯-格里耶感兴趣,他认为他们是迄今最有才华的法国作家。虽然《艺术》自认是罗伯-格里

耶的敌人,并宣称新小说已经死去,但还是勇敢地认同纳博科夫的偏爱。凯诺不在巴黎,《艺术》便让罗伯-格里耶采访纳博科夫,纳博科夫觉得他人跟文一样富有独创。纳博科夫夫妇被罗伯-格里耶的妻子逗乐了,她是一个娇小的演员,来的时候穿得像洛丽塔,扮演成性感少女的样子。侍者让“成人”点完餐前开胃的酒后,转过去问她:“Et un Coca-Cola pour mademoiselle?”<sup>①</sup>大家都乐了起来。<sup>[16]</sup>

#### 四

10月28日渡过海峡后,纳博科夫夫妇被威登菲尔德与尼科尔森派来的车子接到了伦敦。他在那里接受了英国电视最优秀的文学节目《书蠹》的采访,这是他第二次上电视,此前曾要求事先提交问题,这样他可以提前组织并修改答案。因为在巴黎搞得很疲劳,他拒绝了其他几家电视采访,还有六家电台要访谈,他只接受了一家。约翰·维恩为《观察者》采访了他,还有来自《晚旗报》、《旁观者》的采访。他跟格雷厄姆·格林一起吃饭,谈话中间发现,格林从《洛丽塔》的一段文字中\*认定,纳博科夫也是一个改宗天主教的人,但逐渐觉得自己错了。不过,纳博科夫觉得他喜欢社交,并在《洛丽塔》的第一版对格林“勇敢的支持”表示了感谢。\*\*第二天,他跟作家V. S. 普里切特和菲利普·汤因比一起吃午餐,这两人经常评论他的作品,还有罗伊·詹金斯,首个支持修订淫秽出版物法案的人,奈杰尔·尼科尔森,等等。<sup>[17]</sup>

《洛丽塔》定于11月6日(星期五)在英国出版,威登菲尔德与尼科尔森以及纳博科夫本人都还存在被起诉的可能,因此强调纳博科夫声望的运动还要继续。11月4日,他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发表了《俄国经典、书报审查员与读者》的演讲。演讲非常成功,事后诺尔·安南及国王学院院长为纳博科夫安排的宴会也很精彩。尽管受到欢迎,纳博科夫还是觉得,剑桥大学“比起美国的大学

① 法语:这位小姐来杯可口可乐么?

\* 第二部,第31章:“两三年前,在一个对玄学感到好奇的时刻,为了得到一种老式的天主教的治疗方法,我把一个新教徒的枯燥乏味的无神论见解告诉了一个讲法语的很有头脑的告解神父;在他的指点下,我曾希望从我的罪恶意识中推断出存在一位上帝。在蒙着白霜的魁北克的那些寒冷的清晨,那个好心的神父用最体贴、最解人意的方式努力对我加以劝说。”

\*\* 罗伯特·麦克拉姆,《边缘地带的生活》,《纽约客》,1994年4月11日,页53。

来,某些方面有些褊狭,这很奇怪”。<sup>[18]</sup>

第二天,出版前夕,纳博科夫回到伦敦。由于小说的法律命运摇摆不定,《洛丽塔》在丽兹酒店的盛大发行仪式于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不过开明的英国报纸和议员一致予以支持。晚会进行中,奈杰尔·尼科尔森接到内政部检察长办公室一个匿名职员电话:政府决定不起诉《洛丽塔》。尼科尔森爬上桌子,对兴奋的人群宣布了这个消息——《洛丽塔》还是引起了另一种喧闹,因为报纸抗议政府暗中透露消息。以赛亚·伯林曾在支持出版《洛丽塔》的信上签名,七年后的他还记得在那家豪华酒店见过纳博科夫。纳博科夫愤怒地捶着旁边一把椅子,令伯林大吃一惊:“有人认为我是一个俄国作家,可我不是:我是一个美国作家。”<sup>[19]</sup>

在英国经过差不多四年的公开争论后,《洛丽塔》于出版日销售一空。虽然威登菲尔德与尼科尔森的本子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一度遭禁——其他本子在比利时、缅甸遭禁——但它再也没有在英国法院遇到麻烦。

## 五

《洛丽塔》在英国出版后的第二天,纳博科夫夫妇离开伦敦去了罗马。他们从大旅馆的阳台上看风景,沿着宾乔公园漫步,伫立在圆型剧场数百年的尘土之中,在威尼托大街购物,看着黑衣的意大利女看管给毛色油亮的流浪猫喂鱼头,凝视着流光溢彩的黑夜里连绵不绝的尾灯,他们觉得这个城市太美了。他们希望在这里要比在巴黎、伦敦时少受关注,但狗仔队的摄影记者追着他们不放,他们决定,春天再悄无声息地来品味罗马。他们不懂意大利语,对意大利现代文学也差不多一无所知,因此没有理由见当地的文人,他们跟阿尔贝托·莫拉维亚一起吃饭,觉得他很乏味。天气转冷了,雨下个不停。满满一个月与陌生人的访谈、会面与宴会搞得纳博科夫精疲力竭,他准备躲到某个地方去写作。<sup>[20]</sup>

400

几周来,他脑子里一直在酝酿一部新的小说。11月中旬,他跟薇拉去了西西里岛,想寻找阳光和温暖。他们住在陶尔米纳的怡东酒店,又希望能找到一所带家具的房子过冬,营造一种纳博科夫所需要的静谧。<sup>[21]</sup>

像大陆一样,西西里也是汽车轰鸣,甚至还有庞大的巴士,将两排古老的房

屋中间狭窄的过道塞得几乎水泄不通。纳博科夫夫妇没有找到宁静与温暖，而是遇到了雷暴、冰雹和无休无止的雨。他们不喜欢陶尔米纳——在《阿达》中斥之为“米诺陶尔，著名的人工岛”。西西里的记者和摄影师追逐着纳博科夫，地方报亭将从地方报纸上剪下的他的照片及访谈张贴在蓝铅笔画的方框里，大批德国游客和一个德国电影摄制组在他们住的旅馆里窃窃私语、侧目而视。<sup>[22]</sup>

纳博科夫对周围的环境不满意，他无法在这里安居，他躁动不安，找不到写作的空间。一个绿色的雨夜，他正穿过陶尔米纳的花园，突然，他的心思回到将《洛丽塔》改编成电影的可能性。在“小小的夜光中，也许是魔鬼作祟引起的，但其纯粹的亮度异常吸引人”，他看到了小说中“着魔的猎人”的一系列场景，像在彩色电影中一样；当他听着声迹时，他发现了能满足美学效果的解决办法，这是在贝弗利希尔斯宾馆和塔霍湖边一直寻而不得的办法。<sup>[23]</sup>

## 六

不过，他的想法跟哈里斯及库布里克的要求还不相投，他还想找更适宜的气候，于是和薇拉在11月27日北上，去了热那亚。他们乘坐的似乎是二等车，但标的是一等，根本代替不了战前欧洲豪华的一等车厢。他们希望在哥伦比亚怡东酒店只住两三天，然后在城外租住一个房子。他们觉得热那亚和那些房子前身刷的颜色很迷人。他们徒劳地想在热那亚、内尔维、拉帕洛租一个小别墅，  
401 但没有人愿意只给租一个冬季，纳博科夫开始怀疑，安娜·卡列尼娜和伏伦斯基是怎样找到他们的意大利别墅的。<sup>[24]</sup>

起码热那亚的媒体没有注意到纳博科夫，他终于可以消停了。11月30日，还是没有找到可以写作的单间，他在日记中写道：“开始‘地信’。”在日记的其他地方，他为新小说起了别的标题——《亲爱的地球》、《未知地区》、《卢娜来信》——但显然他此刻决定叫《给地球的信》，《阿达》一个主题的预示，范·维恩的第一部著作《地球来信》。范的小说套小说讲述的是特里萨的故事，地球上美国一家杂志的流动记者，她给反地球（范及其读者的世界）上的一位科学家发送信息，爱上了他，从太空飞到他身边，结果发现，在爱人那巨大、湿润的眼里，她只有显微镜下面的生物那般大小。她的信息夸大了地球上的快乐，“事实上是‘宇宙宣传’的工具——要承认这一点是要勇气的，因为地球的特务会把

她猛拽回来,或在飞行中毁灭她”。<sup>[25]</sup>

纳博科夫着迷于太空旅行的神奇,1959年到1966年间曾考虑几种情节,将这种神奇跟星际爱情故事及超级大国秘密的压迫感结合在一起。1964年末,面对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请求,他以下面的梗概作为回应:

一个初露头角的宇航员向一个正在崛起但还非头等明星的女孩求爱。她有点居高临下地对待他;跟他有染,但同时还有其他一些或一个情人。一天,他在首次探险中被送到遥远的星球;他到了那里并成功返回。现在他们的地位变了。他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人,她的明星路却中断了。她如今太高兴拥有他了,但很快发现,他跟飞行前不一样了。她不知道什么东西变了。时间流逝,她开始担心、害怕,接着恐慌起来。关于这个情节,我有不止一个有趣的结局。<sup>[26]</sup>

在纳博科夫的文件夹中,一个没有标日期的笔记为另一个明星故事记载了下面这个简要情节:“第一幕,他准备去一个星球旅行。她不爱他,他爱她。第二幕,走了。消息?没有消息?第三幕,回来。我们从不知道他是真的‘变’了还是星球疯病。”还有一则笔记是第三幕结尾的对话:“我的小[汽车牌子]不像本来那样跑得快了。我也许应该卖掉它。”“真有趣——你以前就说过这话——一模一样。”“我说过吗?”“等一等。你早就卖掉了!”“是的,是的。我一定把话都说完了。”宇航员试着又说了一句,结果发现第一幕也已经说过,这个场景之后不久,他死了。<sup>[27]</sup>

给希区柯克的信之后一年,1965年9月,纳博科夫跟采访人罗伯特·休斯说,他计划写一本小书,叫《给地球的信》,一个动物学家去了一个未知的星球,他写信给地球上的爱人,一个女演员,跟他很亲昵,但不是很忠诚。

关于到达那个星球的事只字未提,全都在幕后。我们一定觉得,他身上发生了某种绝对可怕的事,而他又无权谈论自己的经验。毕竟,这是政府的机密,只要……飞行还在进行。因此他谈论了各种各样的事。他对[地球]产生了巨大的爱。他离得越远,觉得地球越亲切,而不是相反,你知道。他不时用晦涩的、旁敲侧击的话说说他的同事,他不喜欢他们——他们是非常平淡乏味的人——或者说说他最近

的经验。终于他到达了。一共要有 20 封信，第 20 封相当绝望。他知道这是最后一封信，但不敢说这是最后一封。出于某种我们不知道的原因，那些人注定要灭亡。<sup>[28]</sup>

这次采访后几个月，纳博科夫产生了《阿达》的念头，在反地球与地球的关系中，在阿达给范却没有回复的信件和范的《地球来信》的关系中，在卢塞特陷身各种信件和她显然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讯息的关系中，星际主题有了新的曲折。

至此，最初那种浪漫与凶险的混合已经变得无法辨认。但在 1959 年 11 月，纳博科夫的灵感似乎来自纯粹的浪漫感和不满情绪，因为他生活在人类也许是第一次冒险进入太空的时代，而苏联人也许会抢先一步。1961 年，加加林将环行电离层，一年后约翰·格伦跟进，纳博科夫则依旧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有人已经进入太空，他们可能只是发现了一种愚弄雷达的手段，整个活动不过是“宇宙宣传”。<sup>[29]</sup>

回到坚实的土地——准确地说，罗马——纳博科夫在离开这个城市前拍了一个新闻短片。如今在热那亚，纳博科夫夫妇听说片子播映了。他们用初级的法式意大利语试着询问片子的“结果”，答复却是一通复杂的说明，告诉他们哪里是“厕所”。<sup>[30]</sup>

11 月初，他们请出版商阿诺尔多·蒙达多里帮德米特里在米兰找一个歌唱教师。12 月初，德米特里乘“美国号”前往欧洲，他的父母则从热那亚北上去了卢加诺，意大利湖区的瑞士一侧。在大旅馆，他们第一次要了两个相邻的房间，这是他们此后标准的做法，以便纳博科夫不受打扰地写作。到了卢加诺后，发生了一件事，使得他无法写作《给地球的信》。库布里克来电报说，他拒绝了考尔德·威林厄姆为《洛丽塔》写的脚本：“相信你不喜欢结婚是对的句号与名著相约就得忠实尽管众庶及准则反对句号仍认为你是脚本唯一人选句号如果经济细节谈妥你有空否”。纳博科夫回电说，他会考虑，又写信补充说，他比夏天更有兴趣做此事了。<sup>[31]</sup>

## 七

12 月 3 日，纳博科夫一家乘出租车去米兰，住在普林斯萨瓦旅馆。这次是



意大利出版商蒙达多里及其子阿尔伯特盛情接待,安排了隆重的招待会。他们来米兰还要见麦斯托·康泼加里雅尼,他是拉斯卡拉歌剧院经理推荐的一位歌唱教师,为德米特里安排试唱。<sup>[32]</sup>

由于还有更多记者排队等候拍照采访,纳博科夫请求是否可以三四个人一组集体采访,因为他已经不再年轻,这些事情让他心力交瘁。他觉得无法着手处理任何事情:还没有投身《洛丽塔》的脚本,在好莱坞,拉扎尔和库布里克之间的洽商拖了又拖,可能无果而终;还无法把精力集中到《给地球的信》上来。<sup>[33]</sup>

圣诞日,纳博科夫夫妇驱车去了圣雷莫,投宿在埃克塞舍—贝尔维尤宾馆,德米特里带着新的胜利、叶莉娜·斯科尔斯基带着儿子符拉基米尔先后过来。德米特里开始忙于翻译《天资》,家里其他成员似乎也想参与其中。基里尔自告奋勇想把《洛丽塔》译成俄文,他哥哥要他提供一段样文。最后决定,基里尔尝试翻译第一部,叶莉娜译第二部。来年3月,叶莉娜的儿子也将把短篇小说《圈》译成法文。<sup>[34]</sup>

到圣雷莫两天后,纳博科夫写了一首俄文诗《我做的是什么样的坏事》,戏拟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当年早些时候写的一首诗,完成于被迫拒绝诺贝尔奖之后。纳博科夫知道,许多俄侨都因为《日瓦戈医生》而把帕斯捷尔纳克看作圣人,因为《洛丽塔》而把他看作罪人,但在诗歌结尾,他模糊暗示说,尽管与苏联时代相距遥远,但终有一天俄罗斯会为他树立一块纪念碑: 404

但有趣的是,在最后的空格中,  
尽管有校对,还有我时代的查禁,  
一根俄罗斯树枝的影子将  
在我的大理石手掌上摇曳。<sup>[35]</sup>

1960年1月初,纳博科夫一家穿越法国边境,最终在芒通的阿斯托利亚宾馆安顿下来过冬。尽管叫了这么一个名字,但这幢建筑物与其说是一家宾馆,不如说是一排配备家具的公寓。他们住在5号,空间很大,私密性很好,还有一个阔大的阳台,可以眺望蔚蓝的大海。只是卡诺特大街上不时呼啸而过的摩托车的声音破坏了这个景象。<sup>[36]</sup>

就在他们找到一个安全的栖身之所的时候,就在德米特里被康泼加里雅尼